

中国目录学史

姚名达 / 撰

严佐之 /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蓬莱阁典藏系列



中国目录学史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姚名达 / 撰

严佐之 / 导读

蓬莱阁典藏系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目录学史 / 姚名达撰;严佐之导读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9. 5
(蓬莱阁典藏系列)
ISBN 978-7-5325-8909-8

I. ①中… II. ①姚… ②严… III. ①目录学史—中
国 IV. ①G2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33280 号

蓬莱阁典藏系列

中国目录学史

姚名达 撰 严佐之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
(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地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32

印 张 13

插 页 5

字 数 263,000
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8909-8/K·2515
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出版说明

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，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。面对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，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。士人的眼界既开，学殖又厚，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。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，跳出旧传统的窠臼，拥抱新思想的精粹，故其成就者大。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，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，希冀借助今之专家，诠释昔之大师，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、文化背景等。是以本社编有“蓬莱阁丛书”，其意以为汉人将皮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，后世遂称藏书阁为“蓬莱阁”，因借

取而为丛书名。“蓬莱阁丛书”推出后风行海内,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。今推出“蓬莱阁典藏系列”,萃取“蓬莱阁丛书”之精华,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,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。

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导读

严佐之

民初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重要，目录学是其中之一。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《民国丛书》编撰出版新闻发布会上，周谷城教授发言说，民初是可以与春秋战国媲美的第二个学术思想“百家争鸣”时代。此话以及周谷老浓重的湖湘乡音，给我留下很深印象。后来《民国丛书》出版了，收入第一编的目录学著作就是姚名达的《目录学》、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和《中国目录学年表》三种。

姚氏目录学著作三种之中，《目录学》是商务印书馆《万有文库·国学小丛书》的一种，按作者自己的说法：“这是专门研究目录学的著作，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的，所以对于目录的任何方面都简略地讲到了。”（《目录学·自序》）《中国目录学年表》一书，系采用传统史学的年表体式，截取自古至今有关于目录学的零星史事，依时代先后，逐件系年，汇为一编。作者曾打算把《年表》作为一个

篇章合入《中国目录学史》，取名《通纪篇》，置《溯源篇》后，使读者在具悉中国目录学渊源之后，先知全史梗概，然后逐篇研究，以免支离灭裂之弊。但事后发现此篇字数数万，条数数千，每条各占一行，篇幅几与史文全部相等，殊有枝大于干之嫌，才又重新抽出，独立成书，恢复原名，单行问世。因为《目录学》是初学入门之书，《中国目录学年表》为资料汇编，故相比之下，唯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属于原创性专科学术史著作，最符合《蓬莱阁丛书》“尤具开创性”的选辑标准。不过单就史料的丰富和通贯而言，《年表》对读者了解中国目录学史还是很有帮助的。正如作者所说：“此篇悉属原料，从千百书中钩稽而出，考订排比，费事最多。书成自观，殊觉乏味。然欲确知某一史事之年代及其过程，则舍是莫由；苟能一气读毕，对于中国目录学之发展，亦可隐约得一概念；专家用作参考，必可免翻检之烦；且读各主题篇时，必有随手比照，增加领略之功。”（《中国目录学史·叙论篇》）以是之故，建议读者如读毕此书意兴犹存，不妨再把《中国目录学年表》浏览一过。

—

据我知见，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“中国目录学史”命名，全面、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。与传统的、具有一定目录学史性质的著作相比，显然受到西方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影响；与同时代的、兼有目录学史内容的著作相比，则以纯专科学术史研究而迥然有别。谓之开创，未为过也。

晚清革制,朝廷派员出洋考察,学习先进,最先效法并比较见实绩的,大概要算是西方的学校和图书馆了。随着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引进,西洋现代目录学思想理论也很快传入,治图书目录学者,除少数仍固守传统外,大都能抱接受和吸收的态度,唯程度不同而已。我们看姚名达《目录学》一书的篇章名目,全然借鉴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建构的阐述模式,可见这位出身清华园的年轻学者对外来新学的积极态度。再看《中国目录学史》,开卷即先解释目录、目录学的概念和定义,目录学的种类和范围,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,也颇具现代学科理论建设的气象,但其篇目结构却与悉仿西学的《目录学》不尽相同,有点“中西合璧”的味道。

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结构以“篇”为主题,每篇之下各有若干小节;各篇每节,但立标题,不标序数。全书凡十篇,依次为:《叙论篇》、《溯源篇》、《分类篇》、《体质篇》、《校雠篇》、《史志篇》、《宗教目录篇》、《专科目录篇》、《特种目录篇》、《结论篇》。如果算上后来抽出单独成书的《通纪篇》,就该是十一篇。显然,它不像通常写专史那样,从古到今划分几个发展时期,通过揭示各个时期的特点来展现历史全貌,比如清末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、民初蒋元卿的《校雠学史》等。姚名达把他组织中国目录学史的这种方法称作“主题分述法”,并解释其义说,就是“特取若干主题,通古而直述,使其源流毕具,一览无余”(《叙论篇》)。

为什么不用通常的叙述方法去组织中国目录学史?因为在他看来,中国目录学虽然源远流长,但发展进程中的“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

差异”，硬要划分时期，区别特点，“强立名义，反觉辞费”（《叙论篇》）。这样解释或许还有点儿费解，那就让我们参见姚氏《目录学》第二卷第七章“目录学的趋势”里的一段话。他说：“中国过去的目录学，造端于刘歆《七略》，发扬于两晋南北朝，收萎于清季，复兴于今日；但其形态仍不能跳出《四库》的范围外。再可以说一句，自刘歆创《七略》后，虽有郑樵、章学诚等加以精讨，但其范围，只是平面的发展，并没有直线的进步。换言之，自西汉至今日，虽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，而目录学一科，仍就是在一个圈子内打走围，正如同其他学术一样没有进步。”由此可知，姚氏所谓“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”，就是说二千年来目录学形态在本质上仍没有跳出刘歆开创的模式。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，中国目录学史也未尝不可用“断代法”来编写（吕绍虞《中国目录学史稿》即用分期断代法论述），但我们对敢于学术创新的肯定是无需见仁见智的。问题在于，用“特取若干主题，通古而直述”的方法，是否能够，又怎么能够让中国目录学“源流毕具，一览无馀”呢？其实作者知道这样做也有这样做的不足，他说：“此种主题分述法亦有其流弊，一则同一事件而分散于各题之中，不能识其全貌；盖有经无纬，则组织不能周密也。一则文气所至，不便琐陈，以至时代不明，后先倒乱；盖既分题各篇，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，故忽今忽古，使读者迷乱莫明，尤其大患。”利弊相权，怎么处理？姚名达的理念是：“体例为史事所用，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”；具体对策是：“依史事之所宜，采多样之体制”（《叙论篇》）。就是说，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各篇将采用适宜各自主题的史法体制，而不强

求一律。理解这一点,就比较容易读懂《中国目录学史》“主题分述法”框架结构的理论含义了。

《叙论》、《结论》两篇各居首尾,在全书结构中的意义不言而喻。《叙论篇》首先对“目录”、“目录学”等基本概念加以定义,并对古往今来的目录作了分类,在——分析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后,又划定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,末了详细阐明本书框架结构的组织方法,及其所本的学术理念。提纲挈领,宣示宗旨,很符合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规范。《结论篇》以极短篇幅,分别阐述他对古代、现代和未来目录学的感想和希望,实际上也是其目录学基本观点的提炼和总括。

首尾两篇之间为全书结构的主体。第一《溯源篇》,追溯中国目录学的源头——刘向《别录》和刘歆《七略》。设立这个主题,完全出于他对中国目录学发展特点的基本认识:《录》、《略》虽然开创了目录工作和目录体制、分类的基本模式,但也导致了二千年来目录学没有重大突破和飞跃进步。传统目录学既受其庇荫,又长期笼罩在它的阴影中。所以率先引领,以为其下各篇主题之根本。该篇除详述《录》、《略》分类、编目特点外,举凡书籍之产生、传述、整理、校勘、写定以至插架,莫不一一推寻原始,并上溯先秦目录之渊源,详详细细,原原本本。其叙事阐释方式,与其他各篇以主题为纲领的笔法不同,作者自称是“混合叙述”、“追问法”。

《溯源篇》以下各篇皆以主题为纲,通古贯今,看似“独立特行”,互不相干,其实却与传统纪传体史书体制结构暗合。如原来设置在《溯源篇》之下的《通纪篇》,姚氏即明确说是“特用正史之本纪体例”(《叙论

篇》),后来无奈抽去,纪传体制便缺了“本纪”一角。现在紧接《溯源篇》之后的是《分类》、《体质》二篇。为什么?因为姚氏认为,“分类与编目为目录学之两大巨轮,故首及之”(《中国目录学年表·导言》)。并设定其编撰体例相当于纪传体的“志”。为什么是“志”不是“传”?因为这二篇的主题“分类”和“体质”(编目),乃古代目录制度结构最本质的两大要素,性质与其他以目录类型为主题的各篇不同,故其论述方法也不同:“皆所以勘同析异,明变求因,上下古今,分别学派,合数十家为一段,不复胪列条别。所用体例,盖如正史之书志,以事为主,不以人或书为主,重在大势而不重在个体。”(《叙论篇》)《分类篇》讲图书分类法,上自《七略》,下至杜威,尽录古今目录分类之纲要,并论其要旨,评析得失。《体质篇》讲编目的方式方法,因以著录、解题、引得、小序、总序等为“构成目录的质料”,以活页、辞典、类书、年表、散文等为“目录构成之体式”,故改以“体质”为篇名。众所周知,“志”在纪传体史书中统摄典章制度,《分类》、《体质》二篇都是讲目录基本制度,故效其书法,可谓形质兼具。姚氏认为这两篇在全书中最为重要:“欲知中国目录学之主要精神,必亦于此求之。”(《叙论篇》)其中《分类篇》“探讨最深,分析最精”,作者自觉比较满意。《体质篇》则“搜集未广,论证未详”,作者自我批评“最陋劣”。但读者不要因此轻忽此篇,其实里面还是有不少启发人思之处的。

由于《分类》、《体质》二篇都是根据古今公私藏书综合目录的演变来叙述的,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别具特质的目录则无暇顾及。如正史

中的艺文志经籍志,与一般书目大相异趣的宗教目录,与综合性目录相对应的学术专科学目目录,以及那些“性质特别而不限于一科”的目录,等等。所以作者又另作归纳分类,按“史志”、“宗教目录”、“专科学目目录”、“特种目录”立题名篇,各各阐述。若以《通纪篇》之为“纪”,《分类篇》、《体质篇》之为“志”相推拟,那么这几篇的性质、体例,似正可视作纪传体之“传”。《史志篇》以时代为主,凡正史国史艺文志经籍志及后世补志,莫不加以评鹭;《宗教目录篇》以佛教目录为重点,兼及道教目录、基督教目录;《专科学目目录篇》对经解、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文字、教育、科技、艺术等学科的目录与索引,逐一叙述,溯古详今;《特种目录篇》“取为数较多者”,分列丛书、个人著作、地方著作、禁书、刻书、阙书、版本、善本、敦煌写本、举要、解题、辨伪十二门类,并兼及有关妇女著作、家族著作、学派著作、日报要闻、杂志论文、参考书、书评、外国人书籍的目录和索引。这与纪传体史书以儒林、文学、循吏、佞臣等分门别类为人物立传,不是很有些貌合神似吗?

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构想,借鉴传统历史编纂法,使“主题分述”以致结构割裂的负面影响得以消弭。所以我说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结构框架有那么点“中西合璧”的味道。

篇目结构中唯《校讎篇》似稍嫌突兀。此“校讎”盖指广义的整理,而非狭义之校勘。为什么要设立此篇?因为姚氏觉得目录乃由校讎而来,“校讎在目录之先,目录为校讎之果”,“总目录之成,多先经校讎之手续”,“史志之成,莫不据秘阁之校讎”,二者呈因果先后关系,而《分类

篇》、《体质篇》仅按总目录的形态特质来叙述分类、编目的演变,没有涉及“前因后果”,所以要另以“校讎”立题设篇,“以述历代朝廷校书著录之事”。但以我之陋见,目录之学固然由校讎而来,若谓之密不可分,那也只是维系在朝廷秘阁藏书这一层面上。如作者所说:“古之书籍,未经校讎,难于著录,故两事相因,不易分辨。中世以藏书为炫耀,秘府往往抄写旧书为一律之体式,校勘整理俱所不免,写定之后,亦有目录。近世私家善读书者,则广勘众本,考定异同,择善而从,蔚成专科之学。藏者不必能校,校者不必自藏,目录学之与校讎学(校勘),遂截然两途矣。”(《校讎篇》)秘阁校书既与官书总目录相因,写目录学史当然不能不顾,但二者既已截然分途,叙述亦宜以目录为纲,与其为“校讎”谋篇,不如为“公私藏书总目录”立“传”,凡“历代朝廷校书著录之事”,都附系于各重要秘府书目下逐一铺展。这样,既照顾了目录学与校讎学的这层关系,又避免了理论框架上的结构“错位”,同时也可使目录之“本传”更显丰满。

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的理论框架决非无懈可击,但确有创意。姚名达《自序》提及此事亦颇为自许,说:“对于编制之体裁,杂用多样之笔法,不拘守一例,亦不特重一家,务综合大势,为有条之叙述,亦一般不习见者。”在我看来,这的确不是过分的自诩。

二

早在《民国丛书》出版之前的1957年,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就已由商务

印书馆再版重印。著名图书馆学家、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在再版《后记》中说：“姚名达先生的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编写与出版将近二十年了，今天我们来翻印它，是由于它本身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功用和价值。在过去几十年内，关于‘中国目录学史’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，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，或在编写内容方面，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作为最好。”这是很有权威的评价。姚著于文献资料广采博搜，读者随手翻检，即可领略，自不必于兹赘言。至于编写内容，作者《自序》尝称“书中论断多出心裁”，并“姑举数端，聊示一斑”。若《别录》无辑略，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属丛书，《隋志》分类乃《七略》、《七录》嫡裔，佛经《旧录》、《别录》即支敏度《经论都录》、《别录》；若目录必兼有解题和引得，丛书必须拆散归类，文集宜改入总类，等等。今亦就读书所得，略举数端。

首先说说“解题”。姚名达虽然为中国目录学写下洋洋洒洒的通史，但他对古代目录学成就并不推崇，总体评价甚至较低，认为“二千年来校讎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”，质疑“中国之目录学无乃尚未成功”（《叙论篇》）。独有“解题”得到他不吝其词地赞赏，说是传统目录体制中最具中国特色、唯一优于西洋目录的地方。

重视解题的作用、意义，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并非开先之作。余嘉锡《目录学发微》提出“篇目”、“叙录”、“小序”为传统目录体制三大要素；且以“解题”取代“叙录”，区别目录种类：“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，书名之下有解题者；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；三曰小序、解题并无，只著书名者。”并强调解题于目录之学术性尤见重要：“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

者,固薄其浑漫,视为无足轻重;即有解题,若其识解不深,则为美犹有憾。”“凡目录之书,实兼学术之史,帐簿式之书目,盖所不取也。”《目录学发微》虽迟至 1962 年才正式出版,但余嘉锡从 1930 年起即持为讲义,在北京各大学讲授,翻印传抄,习者众多。他的“目录体制”学说,旋为后来目录学著作承袭沿用,视同经典。如 1931 年出版的刘纪泽《目录学概论》,论体制、派别,就已一本其说;姚名达《目录学》“目录的派别”一节亦同其说,该书出版于 1933 年。不过,余嘉锡论述解题只在原原本本推寻叙录体例的本原,对其发展演衍出来的各种变例无一阐发,而这在《中国目录学史》里得到了很好的继续。

书中论解题者仅三四处,篇幅也都不大,但其见解、论断颇有新意,并多能切中肯綮,发人思考。比如他提出目录分类应从多方面着眼,若“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,则有纯书目(有仅记书名、著名、卷数者,有兼记版本参考事项者)、纯解题(有于书目后作解题者,有于书籍中做题跋者)、兼书目及解题之异”(《叙论篇》)。又比如他在区分目录体制时撇开“小序”,突出“解题”和“书目著录”,打破了余氏按“篇目”、“叙录”、“小序”三要素区分目录的框樊。这是从宋元以后目录实际出发重新树立的区划标准,很有道理,大有必要。因为事实上有小序的书目只占很小比例,特别是宋元以后,罕见“有小序而解题者”,唯多“有解题而无小序者”,再按余氏标准类分,根本行不通。另外,清以来书目著录变化很大,书名、著者名、卷数及其他参考项,大大超出原初“篇目”的内涵,再固守余氏标准,根本管不住。所以后来有人就按有无解题分作两大类,

但还不及姚氏合理,因为确实还有“兼书目及解题”者,比如清代张金吾的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。遗憾的是,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后世治目录学者的充分重视。

书中又正式提出“解题目录”这一概念,并予以体例、内容上的分类和分派。说自刘向《别录》出,“遂开后世解题一派,然目录未必有解题,解题亦未必皆同体例。刘向《别录》所开之风气,后世有完全接受者,有撮取精华者,有偏举局部者”(《体质篇》)。又说“自解题内容之旨趣分之,则有解释内容、订正讹误、考索存佚、研究版本、批评是非、叙述源流之异,又或兼而有之”(《叙论篇》)。所谓“完全接受者”,是指能对《别录》体例“皆一一详论”的目录,如刘宋殷淳《四部序录》、唐元行冲《群书四录》、北宋《崇文总目》、南宋《中兴馆阁书目》、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一类。“撮取精华者”,指“各方面皆已论到,而又不如《别录》之详尽”一类,如刘歆《七略》、唐毋煚《古今书录》、清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等。“偏举局部”包括二方面意思:一是指那些“精神时有所偏,不能每书皆逐一研究其各方面,体例不能纯洁”的目录,如刘宋王俭《七志》、南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明高儒《百川书志》等;二是指那些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发展的目录,如清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、黄丕烈《百宋一廬书录》、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“特别注重版本方面”,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经籍考》“备录成说以备考证之例”,等等。

此外,《特种目录篇》还专设“解题目录”一节,主要讲两个问题。一是讲古代的解题目录。说“解题”之名始于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陈、

晁二志“详略略等”，与《七略》、《七志》“同一系统”，与《四部序录》、《古今书录》、《百川书志》、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“皆相附而成流派”。说解题目录就是《别录》体制的“撮取精华”一派和“偏举局部”一派，较之《别录》及其“完全接受者”，“则具体而微”；“较之一般有目无叙录者，则增出‘解题’之语”。这与《体质篇》说法小有差异，不知是后来的改变还是本来的疏忽。二是讲现代的解题目录。说古代解题“皆典藏目录”，与现代解题的概念不一样，“现代之解题实即读书指南，非复古义矣”。并举吕思勉《经子解题》、梁启超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为例，介绍其体例内容特点。

总之，《中国目录学史》论“解题”，文字不多，篇幅不长，观点未必完全正确，论述也不够周详严密，但却富有学术上的创意和挑战性。我们尽可不必苟同，却不能无视或轻视。可惜其中不少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，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争辩讨论。学术欠长进，回头再看，竟然新意犹在。

其次谈谈《宗教目录篇》，主要是其中的佛经目录，着重看作者治目录学史的方法。

《宗教目录篇》是文字最多的一篇，几占全书四分之一。从整体看，确实有些失衡，反过来说，当然最为详尽。尤其讲佛经目录，在迄今为止的目录学史著述中，似尚无出其右者，欲知佛录史，此书甚宜。不过对此篇感兴趣的不会多，读者往往匆匆翻过，草草了事，我初读就这样，基本上没看。但是，如果看佛录只在求知佛门经籍，那么没兴趣的不读